

外方傳教士、中國基督徒與辛亥革命

狄德滿著 傅慧琳譯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掀起了中國邁向共和政治的革命熱潮。經過數星期的軍事衝突，大清皇室的幼主被迫在翌年二月退位。隨着帝國政權的末落，支配着社會與知識文化的儒家傳統亦受到貶抑。本文嘗試探討不同國籍與宗教傳統的外方傳教士（不論天主教或基督新教），以及中國本土的基督徒，對一九一一年底至一九一二年頭發生的事情的種種觀察和反應。¹中國的

共和運動並非一次有組織的革命，而是由不同地方的改革者或革命團體，與會黨、土匪、地方保衛機關、學生或改革派的精英份子聯合起來而形成。激進但較為鬆散的政治組織，特別是孫中山及其合作者在一九零五年成立的、包含光復會與革命黨的同盟會，已經滲透了駐紮在中國各地、經過現代化改革的新軍。因此，辛亥革命為中國的各個省份，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

¹ For an analysis of these complexities and spatial variations, or what John Lust has called “this confused situation”, see Lust, “Secret Societies, Popular Movement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in: Jean Chesneaux (ed.), *Popular*

基督信仰與晚清帝國

在歷史上，革命與基督信仰是不相容的。然而，在十九世紀的最後數十年，外國傳教士開始對晚清帝國的事務表達不滿，有些人更提倡重要的改革。

他們把守舊的制度視為宣揚福音的一大阻礙，認為地方紳士和政府官員的反對，引起、甚至加劇了頻繁的反基督徒衝突。² 另外，在一七四二年的禮儀之爭中，中國的禮儀被羅馬天主教廷禁止，導致天主教「以及後來的基督新教」傳教士皆以「儒家學說」或「儒家社會制度」為全面宣傳福音的根本阻力，而孔子則成為中國歸化的最大敵人。魯南代牧區的安治泰代牧（John Baptist Anzer 鮑正會士，1851-1903）就會視這場

意識形態上的抗爭，為一場與「黑暗王子」——孔子——的武力對抗。³ 對舊社會制度的反抗，在一八九零年代日益嚴重，最終引發一九零零年那場災難性的義和團之亂。

這次大爆發的其中一個重要結果，就是在基督信仰與晚清的管治階級之間，出現復交的可能性。由政府提出的新政，例如廢除科舉制度，給予主張改革的傳教士一個機會，特別在教育和公共衛生的領域，參與改革。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期的天主教傳教士，並未有足夠的能力和資源去推動改革。在十九世紀，從外方到中國傳教的神

³ 有關安治泰對儒家的抗拒，請參閱狄德滿著，《華北的暴力和恐慌：義和團運動前夕的基督教傳播和社會衝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頁190-191。虧數目的爭議，請參閱狄德滿“Missionaries, Imperialism and the Boxer Uprising: Some Historiographical Considerations”，收錄於古偉璽（編）《東西交流史的新聞：以基督教為中心》，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頁309-357。

² 參閱邱寶強著《中國基督教的原因：1860-1874》，(Taipei: Wenjing Shuju, 1973).

父，甚少注意爲基督信徒與非基督徒設立完備教育制度的需要。一九零零年以前，教育工作大多在鄉村學校、教理講授班或培育年輕男士成爲國籍神父的修院中進行，而高等教育〔中學及專上學院〕則尚未開始。除了一所由法國耶穌會士於一八五一年在上海創立的徐匯公學，⁴ 直到一九零三年，馬相伯才創立上海震旦學院，該校自一九零五年後交由法國耶穌會士管理，改名爲震旦大學。⁵

⁴ See Joseph de la Servière SJ,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Vol. 2: *Mgr Borgnié (1856-1862) Mgr Languillat (1864-1878)*. (Zikawei, Shanghai, preface dated 1914), p. 277. See also Li Tiangang, "Christianity and Cultural Conflict in the Life of Ma Xiangbo", in: Ruth Hayhoe and Lu Yongling (eds.), *Ma Xiangb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1840-1939* (Armonk, N.Y.: M.E. Sharpe, 1996), pp. 102-107.

⁵ For details, see Jean-Paul Wies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irst Aurora, 1842-1905", in: Noël Golvers and Sara Lievens (eds.), *A Lifelong Dedication to the China Mission: Essays Presented in Honor of Father Jeroom Heyndrickx*,

二十世紀初出現在山東省南部的「德中學校」，是另一個天主教教育事業的少數例子。該校作爲天主教教育事業的一個實驗，座落於一個鮮爲人知的區域，歷時也十分短暫。⁶ 一九零一年，總督袁世凱(1859-1916)准許安治泰主教於一九零二年分別在兗州及濟寧建立兩所「德中中學」，並由上海政府提供資助。⁷ 為避免因官立學校學生

CICM,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5th Birthday and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F. Verbiest Institute K.U. Leuven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K.U. Leuven, 2007), pp. 705-735.

⁶ On the educational programme of the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in Shandong after 1900, see Karl Josef Riviarius SVD, *Traditionalismus und Modernisierung: Das Engagement von Bischof Augustin Henninghaus auf dem Gebiet des Bildungs- und Erziehungswesens in China (1904-1914)*,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4).

⁷ Richard Hartwich SVD, *Steyler Missionare in China I. Missionarische Erschließung Südshantungs 1879-1903. Beiträge zu einer Geschichte*. (Sankt Augustin: Steyler Verlag, 1983), p. 469.

必須參與恭敬孔子的禮儀而再次掀起紛爭，安治泰主教將兩所中學定為私立的中學。⁸直至一九零七年，在中國的知識份子中間，發展出極強的民族意識，並將儒家學說視為中國的國教，以表達他們的民族感情。當中國政府堅持所有學生都必須尊崇孔子，聖言會士決定不與清政府更新一九零九年的中德特別協議，因而結束了這次在教育方面的嘗試。⁹該會神父轉而建立聖方濟沙勿略學院，繼續宏揚「新學說」。¹⁰

⁸ Konrad von der Goltz to Imperial Chancellor, Extract from report B.295 of 4 November 1902, 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 Deutsche Botschaft China, Aktenbestand Peking II, vol. 340, f. 7.

⁹ For an account of the dissolution of German-Chinese school agreement, see Rivinius, *Traditionalismus und Modernisierung*, pp. 130-133.

¹⁰ For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see Roman Malek SVD, "Christian Education and the Transfer of Ideas on a Local Level: Catholic Schoolbooks and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from

相比之下，「主流」基督新教的傳教士，視教育工作為傳教工作的一個重要部分。他們到處建立學校，形成我們所熟悉的小學、中學、專上學院的三層架構，並促成書院與大學的合併。在晚清的最後數年，這些學校發揮着傳播新理念、新方法的作用，為中國社會帶來深遠的影響。可是，中國政府透過崇敬孔子的命令，試圖控制外方傳教士創辦的學校，阻止它們的發展，這導致傳教士對中國政府十分不滿。另一個令衝突惡化的原因，是多個省政府故意禁止傳教學校的畢業生參與公共事務。因此，在辛亥前夕，很多傳教士和中國本地的基督徒，開始對保守的滿清人及他們的漢族合作伙伴產生反感。美國北長老會秘書長布朗（Arthur Judson Brown）指出：「傳教士和中國的基督徒之所以對滿清皇朝反感，不是因為它

Shandong (1882-1950)"，收錄於王成勉（編）《將根紮好：基督教在華教育檢討》，台北，黎明文化事業，2007。

是一個皇朝，而是因為它的腐敗，以及對自由和進步的抗拒。」¹¹

清政府固執己見的態度和根深柢固的保守主義，令很多思想開放的基督新教傳教士、教會領袖和學生，都更積極地參與改革中國的運動。各地方主張改革的精英份子開始意識到傳教工作是推動中國現代化的力量，促使傳教士成為知識份子的合作伙伴。歷史學者唐日安（Ryan Dunch）指出，在二十世紀的首十年及辛亥革命中，特別是在福州等重要城鎮，中國的基督新教信徒有份參與各種社會及政治運動。他提出與主流中國民族主義者不同的意見，認為特別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的基督新教信徒「並未放棄民族主義的思想，相反，他們對民族的熱情，使他們更願

¹¹ Arthur J. Brow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1912), p. 125.

意接受基督信仰」。¹² 在福州，美以美會的教會組織在改革運動中十分活躍，有些社會運動的活躍份子曾於福州鶴齡英華書院接受訓練。同時，中華基督教男青年會「比其他信奉基督新教、開放及專業的團體，召集了更多有志者參與民族運動。」¹³ 中華基督教男青年會是一個以基督新教的傳教書院為發源地的學生組織，「透過會議、公開講座、書室、出版及傳教學校等活動，教育和動員人民的力量來改變中國。」¹⁴ 唐日安指出，在辛亥革命前夕，中國基督新教信徒如何投入福州的社會和政治事務，這情況亦發生在中國的其

¹² Ryan Dunch,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xvi.

¹³ Ibid., p. 49. It would seem that in Fuzhou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produced a far greater number of activists than the American Board Mission 美籍會 or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英國傳道會。

¹⁴ Ibid., p. 69.

他主要城鎮。傳教士們深信，基督宗教信仰為改革中國帶來「有建設性的影響」及深入的改變；事實上，很多活躍的中國革命份子都是基督教徒，或曾在基督教的傳教學校接受教育。有些主張改革者曾與傳教士有個人接觸，或曾讀過他們出版的刊物，在思想上深受傳教士的影響。因着傳教士與改革派的關係，傳教團體大多以為革命份子會比清政府更願意給予他們宗教自由。

革命鬥爭中的傳教士和基督徒

武昌起義後，革命運動在中國的大部分地區，演變成一連串的流血政變，省領導相繼宣佈「獨立」。好幾個傳教士留下來的記載，均對這些在上海及長江下游發生的事件作出正面的評價。

在南昌等地，人民卻為革命份子的來臨感到緊張。根據一位遣使會士的觀察，南昌人民並非害怕革命黨，而是在無政府的狀態下，軍閥和土匪會趁機大肆搜掠，人民因此自發成立保衛家園的

軍隊。但當革命份子來臨時，權力的轉移卻十分平靜，到處都可見到示意投降的白旗及反君主制度的標誌。¹⁵ 在九江、寧波和上海的遣主會士，紀錄了革命黨進駐時，同樣低調的權力轉移。在這些地方，傳教士不大擔心清政府軍與革命份子之間的武力衝突，因為雙方都確保外國人的生命與財產受到保障。¹⁶ 《教務雜誌》中的一篇文章更形容這場革命是「一次倫理上的覺醒，整個戰爭過程均符合一個文明社會所應有的表現。」¹⁷

中國的基督徒，特別是基督新教的信徒，不但傾向支持共和運動，更直接參與革命。唐日安在他對福州基督新教的研究發現，循道衛理教會的傳教士的學生有份參與打鬥，只是不讓傳教士

¹⁵ Paul Monteil 穆德良 CM to Maurice Bouvier 鮑維翰 CM, Nanchang, 1 November 1911, in ibid., pp. 73-74.

¹⁶ *Annales de la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 77.1 (1912), p. 71.

¹⁷ *Chinese Recorder* 43.1 (January 1912), p. 1.

知道而已。¹⁸ 在上海，中國基督教會十分支持革命黨。因着傳教士對非信徒所懷有的友善態度，基督教會希望在當時的政治鬥爭結束後，傳教事業能得以恢復。由於期望中國人民會對基督信仰產生興趣，上海中國教會組織佈道會，跟進紅十字會在醫院及軍隊中的工作。¹⁹

在南京，誓死忠於清政府的人士拒絕屈服。

根據法國耶穌會士艾賈沃(1852-1930)的記載，兩江總督張人駿(1847~1927)及來自滿州的江寧將軍鐵良(1863-1939)均有意將城池交予革命份子，但他們的提議被駐守長江的漢族將軍張勳(1854-1923)否決。張勳在十一月七日取得南京的控制後，立即對懷疑是革命黨的中堅份子進行清剿，任何攜帶刀矛或穿著歐式鞋帽的人都被就

地斬首，有些基督教學生因為削掉辮子而被殺。²⁰ 直到十一月二日，革命軍才能把清政府軍驅逐出南京，而在前一個晚上，張勳與二千名士兵逃走至江蘇。當新統治者開始剿滅剩餘的滿州人和政府軍時，艾賈沃神父收留並照顧了五十名年輕士兵，以及約二十名在天主教女子學校就讀的滿族學生。²¹ 類似的傳教士活動亦發生於安徽省首府安慶：耶穌會士聯同美國的基督教徒，晚上利用城牆上的繩梯，救出了前清的總督朱家寶(1860-1923)。²²

¹⁸ Gain, Nanjing, 10 November 1911, in *Relations de Chine* 3rd series, vol. 4 (January 1912), p. 324.

¹⁹ Gain, 2 and 5 December 1912, in *ibid*, pp. 333-334.

²⁰ Report from Anqing, in *ibid*. p. 338. Having initially defended the imperial order, Zhu was eventually persuaded to declare Anhui independent from the Qing government. He briefly served as provincial military governor 總督 from 8 November to 28 November 1911. See also the brief account by Robert Roberfroid SJ in *ibid*, pp. 317-318.

¹⁹ John Dartoch, "Current Events as Seen Through the Medium of the Chinese Newspaper", *Chinese Recorder* 43.1 (January 1912), pp. 32-33.

在中國沿海的城市，本地的基督教傳道員、教師和中學生等知識份子，大都傾向支持革命活動，有些甚至直接參與其中。但是，我們需要注意，意經歷現代化的大都市與落後的農村地區之間的明顯差異：在農村，平信徒對革命活動抱着猶豫的態度。在廣東北部，巴色會的傳教士認為信眾非常熱切，雖然傳教學校內的本地學生都願意削掉他們的辮子，但沒有充足的證據證明他們直接參與軍事活動。某些傳道人和教師積極招攬基督徒加入「民兵」，亦有其他基督徒為革命黨人提供支援，這些活躍份子成為革命黨與基督教平信徒之間的橋樑。²³ 在位處內陸的四川省，根據秦和平對該省的基督教發展史的研究，基督教教會成員被徵召參與護國和革命的運動；在鄰近成都的

廣漢〔前名為漢州〕，信徒每晚為四川保路運動的進行和宣統皇帝的開明而祈禱。²⁴ 我們只能推測當時的信徒明白他們的祈禱有何意義。

其他的歷史記載似乎都顯示平民百姓對新政治改革不太積極。相反，柏拉茲尼克指出，在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國很多農村地方均有激烈的反清及反現代化抗爭。²⁵ 這種對改革的抗拒在辛亥革命期間十分明顯：雖然革命通常被視為爭取現代化的運動，但大多數的平民卻視這場為抗拒現代化的革命。我們通常認為削辮是反抗滿族統治的情緒表現，但為很多人，特別是鄉郊地區的平民來說，漢族人削辮「並非為反抗滿清政府，而

²⁴ 秦和平著，《基督宗教在四川傳播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關於 Jeff McClain's review in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2.2 (2007), p. 291.

²⁵ Roxann Prazniak, *Of Camel Kings and Other Things: Rural Rebels Against Modern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anham, MD : Roman & Littlefield, 1998).

²³ Thoralf Klein, *Die Basler Mission in Guangdong (Südchina) 1859-1931* (Munich: IUDICUM Verlag, 2002), p. 430.

是爲反抗滿州人所實施的洋化改革。」留辮子的傳統，並非象徵對滿州人的順從，而是他們作爲中國人的身分。²⁶ 在中國的某些地方，短髮被視爲西化改革的象徵，而西化的政策「導致高賦稅和反映外國勢力的入侵」。在四川，人們對西方國家有極強的敵對情緒，反抗者沒有剪掉辮子，反而按照明朝戲劇的風格把頭髮束起來。「不足一年之後，四川的第二大城鎮重慶，發生了紅燈黨起義的事件，目的是爲恢復滿清統治、殺滅外國人及任何沒有留辮的中國人。」²⁷

由於大部分中國的基督徒居住在郊野地區，我們可以假設，他們的反現代化情緒與非基督徒同樣激烈。他們都生活在同一個農業社會，而農村的文化與改革派和「基督徒知識份子」所居住

的沿海和內陸重鎮之間有天淵之別。對革命的支持亦視乎個別的傳教士或團體如何影響民眾對改革的態度。提倡現代化和鼓勵政治改革的主要力量，來自「社會福音」的擁護者，基督教主流教會中以美國基督教徒爲首的開明派。另一方面，保守的基要派和宣教會比較着重直接向民眾傳教的工作，甚少關注社會及政治事務。有些較爲激進的宣教會傳道人視辛亥革命後的混亂局面爲末世來臨的徵兆。至於羅馬天主教會的神父，雖然積極地參與各種社會事務，但他們反對政治和宗教方面的自由主義，他們不鼓勵信徒參與當時的政治運動。這些因素均影響不同地方的中國基督徒如何回應革命所帶來的挑戰。傳教士和信徒所關心的，始終是社會的安定，好使他們能宣揚和實踐他們的信仰。

²⁶ Henrietta Harrison, *China* (London: Arnold; New York: Co-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35.

²⁷ Ibid., p. 137.

武昌起義對北方的各省份所造成的影响不大。德國的聖言會士薛田資神父(Georg Maria Stenz, 1869-1928)在十一月從南山東傳來的報告

中說：「除了少數經驗較豐的人外，我們對革命所知不多……這不過是一場由愚笨的、歷練不足的年輕人所演的戲……民眾都不太關心這件事。」雖然如此，他懷疑民眾對革命漠不關心的態度能維持多久。薛田資神父知道在中國南部發生的流血事件，以及大部分中國人都支持革命，幾乎所有官校的學生都已經割掉辮子。「我們的男學生也願意這樣做，但我暫時不會容許。南京的學生們已經把辮子剪掉了；但當朝廷軍隊再次佔領南京時，那些沒有辮子的男人都被斬首示眾。」²⁸

在這混亂的時代，傳教士並不只是旁觀者。

除了日常的牧民工作外，他們還為逃避災難和受驚的基督徒及非基督徒，提供食物、住屋、醫藥和保護，有時亦會擔當軍閥之間的橋樑。一九一二年一月八日，安徽北部一支背景不明的軍隊，

以革命的名義，在沒有動用任何軍火的情況下，佔領了位於安徽省渦陽的縣城，釋放了所有囚犯，鎖起了衙門的官員，縱火焚毀當時極受人民憎惡的地方政府首長的家宅，向城中的窮人分發穀物。數星期後，北京委派其中一位受袁世凱重用的姜桂題（1843-1922）總全權大使，與當地的「革命」軍將領談判。令人驚奇的是，法國耶穌會士戴思聰神父（Joseph Dannie, 1867-1923）被邀請作談判雙方的調停人。²⁹

²⁸ Stenz to his sister Maria and her husband Eduard Koll, Jining, 30 November 1911, in: Puhl, p. 166.

²⁹ For an amusing account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Dannie's mediation and the gratitude shown by the townspeople, see his letter of 10 February 1912, in *Relations de Chine* 4 (October 1912), pp. 520-523. For further details, see R. G. Tiedemann, "Anti-Christian Conflict in Local Perspective. The Life and Times of Pang Sanjie: Patriot, Protector, Bandit or Revolutionary?", in: Peter Chen-main Wang (ed.), *Contextu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 Evaluation in Modern Perspective* (Sankt Augustin, Germany: Monumenta Serica, 2007), pp. 243-275.

以上所提及的，只是天主教神父在革命後的數個月擔當協調者的眾多例子之一。艾賚沃神父指出，雖然天主教會的神父在一九一一年至一二年間的地方衝突中保持中立，但他們不時協調軍閥之間的談判。

在湖北、陝西、南京、山東、徐州府、安徽，帝國主義者（即擁護帝制者）、韓靼人、共和派、強盜組織等，輪流或同時間要求傳教士充當聯絡人，為他們說話或仲裁。這些傳教士從不拒絕他們的請求，即使面臨困難、危險，為了停止流血事件、減少破壞和平息憤怒，他們願意作締造和平者。³⁰

另一宗較危險的傳教士調停事件，發生在山東省東部。共和派軍隊在煙台（芝罘）建立了前哨基地，因而活躍於山東半島的高密、即墨及諸城等地。德國的聖言會士顧思德神父(Josef Koesters, 1870-1922)在一羣當地學生的協助下離開了諸城，該城於一九一二年二月一日被革命黨的一支軍隊佔領。「雖然我們從報章上得知，真正的革命黨人的政策並非反對基督信仰，但沒有人能預計，當這秩序鬆懈時，革命黨會對我們做些甚麼。」雖然顧思德神父有所顧慮，但仍准許諸城地方官吳助在其傳教中心匿藏。顧思德神父宣稱他已成功地調停了革命黨與諸城地方官的衝突，「革命領袖和傳教士之間達致和平的交流，並且維持了數天。」可是，吳助卻派遣使者向山東總督報告諸城失陷，要求軍隊增援，因而令事件惡化，亦使傳教會陷於危險之中。二月十一日，一名戰士假裝成乞丐，帶着由朝廷軍隊統領發出的信件來到傳教中心，通知顧思德神父官軍即將對革命黨發動攻擊，要求他立刻離開。面對即將發生的危難，顧思德神父主動提出為諸城的顯要

³⁰ Leopold Grain, SJ "Dans la Chine nouvelle", October 1915, in *Etudes* 146 (15, February 1916), p. 508.

與官軍之間進行協商，經雙方同意後，顧思德神父便離開了官軍的陣營。但是，在同一時間，另一支官府軍隊來到諸城並開始殺戮，革命黨被打敗，有多名革命黨人被殺。由於朝廷軍兵在城中搶掠，當地的有錢人都執拾細軟，到傳教中心暫避。某些受神父們保護的富豪會示意要皈依成為基督徒，「但當危險過去，他們又恢復舊習，吸食鴉片，娶妻納妾。」³¹

在諸城事件中的生還者，同盟會會員王麟閣，對此事的記述有些不同。他認為「反對派的」天主教神父顧思德並非調停者，而是吳勛的合謀人和官軍的間諜。可是，王麟閣的記述是在一九五零年代，政治意識形態處於高峰時收集得來的，該記述結束的部分，有一張在諸城事件中被

殺的二十三人的名單，其中一位是巴陵信義會的姓田的宣教士。³²

總括來說，官軍和革命軍都會採取保護基督教傳教事業的措施。居住於內陸地區的傳教士比較關心「土匪與海盜在政局混亂之時組織起來、趁火打劫的危險」。³³ 社會中普遍的無政府狀態所帶來的動盪，因各地的天災而惡化。在甘肅省，非常規的軍事部隊、秘密會社和不同回教教派的衝突，令清朝遺臣與革命份子之間的爭鬥更加複雜。美國和英國的使節都會指示居住於內陸地區的傳教士們逃難至條約港口，但由於地理位置偏遠，對甘肅的傳教士來說，逃亡是比較困難的。身處於中國和西藏文化前線的甘肅，宣道會

³¹ Josef Kösters SVD, "Die Revolution in China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Mission", *Seyler Missionsbote* 39 (1911/12), pp. 171-174.

³² 王麟閣，「即墨·高密·諸城獨立志回憶」，收錄於《山東近代史資料》，第11卷，頁232-236。

³³ "The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37.20 (17 February 1912), p. 314.

士艾自新(David Paul Ekwall, 1871-1912) 這樣描寫當地基督教徒對革命的態度：

假若革命軍、官軍與回教徒發動攻勢，我們將在本省內面臨三方戰鬥……為甘肅省內的民眾，不論是平民或外國人，最令人憂心的是甘肅回教徒的起義，因本省的三分之一人口是回教徒。中國人十分害怕回教徒發動攻擊的可能性，誰知道他們受到刺激時，會像墳墓一樣對人殘忍。因此我們有理由擔心，如果皇軍和革命黨也不能控制這新的反抗勢力，甘肅省的傳教士們可能需要聚集在一個地方，互相保護，直到政府派軍隊援助我們，或者與革命軍的領袖商量，把我們送到沿海的安全地方。³⁴

艾自新甚至提議傳教會取得的一座佛寺，「在幾位意志堅決的男士的保護下，應當可以武裝起來，能夠抵抗土匪的侵襲」。³⁵ 最後，甘肅省的傳教士在幾無損傷的情況下，度過了革命後的艱難時期。

根據聖母聖心會的比利時傳教士的報告，中國西北部地區在革命期間陷入無政府狀態。因土匪的掠奪日益嚴重，聖母聖心會的神父們將基督徒組織起來，成為幾個小社團，為保衛家園和抵抗土匪的襲擊。最令人憂心的是哥老會（亦稱斧頭幫）的活動：哥老會在內蒙古西南代牧區的小橋畔村進行搶掠，由黨以仁神父(Juul Tanghe, 1876-1913) 領導的基督徒將滋事者從內蒙古的城川中趕走。當革命黨進駐西北地區，土匪和秘密會社的活動受到控制，治安得以恢復時，傳教

³⁴ Ekwall, "Present Conditions of Foreigners in Kansu", *The Alliance Weekly* 37.25 (23 March 1912), p. 392.

³⁵ Ibid., p. 395. See also idem, "From the Tibetan Borders", *The Alliance Weekly* 38.4 (27 April 1912), p. 56.

士和基督徒才鬆了一口氣。³⁶

歷史遺留下來的紀錄，大多遮掩了革命黑暗的一面。這場革命當然不只是對君主政治的挑戰，亦是反滿州人統治的事件。一直以來，滿州人是一個外來的、不同的、但擁有特權的種族，居住於各個大城市中分隔出來的、封閉的地方。³⁷ 隨着非理性的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首十年的興起，很多居住在城市中的中國社會活躍份子都醞釀出富種族主義色彩的革命情緒，一些激進的種

族主義秘密組織相繼成立」。³⁸ 很多新軍成員亦受到同盟會反滿清統治的思想影響。中國的報章利用任何一個機會，仔細報導一百五十年前「滿州人的罪惡」，激起民眾反滿清統治的情緒。聖教書會在中國的聯絡人竇樂安(John Darroch, 1865-1941)承認普遍中國人都在思想和行動上表現出極強的民族情感，但他懷疑對當時滿州統治者「殘殺人民」的指控，是想像出來或誇張失實的事情。³⁹ 針對旗人的最猛烈攻擊，發生在陝西省的首都西安。一九一一年的十月二十一日，新軍向滿州人駐軍的城市發動有組織的、殘忍的攻勢。大英浸信會的成廉同慕德(Ernest Frank Borst-Smith, 1882-1958)這樣形容大屠殺的慘狀：

³⁶ The account is based on several reports in *Missions en Chine, au Congo et au Philippines*, vol. 24 (1912). On competing Muslim activities in Shaanxi and Gansu, see also Jonathan N. Lipman, *Familiar Strangers: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Chapter 5.

³⁷ For further details, see Edward J. M.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³⁸ Joyce A. Madancy, *The Troublesome Legacy of Commissioner Lin: The Opium Trade and Opium Suppression in Fujian Province, 1820s to 1920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90.

³⁹ Darroch, pp. 24-25.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必定使所有受文化薰陶的人充滿痛苦和憎惡，就是滿族人的滅絕行動……他們的城市被縱火焚毀，有許多人被活活燒死。大屠殺維持了三天，不論是男人、婦女或小孩，都被無情地殺害。⁴⁰

另一位英國浸信會傳教士祁仰德（John Charles Keyte, 1874-1942）這樣寫道：「滿族人發現他們已不能再抵抗，就有許多人跪下，放下他們的武器，哀求士兵們饒命。當他們跪下時，就被士兵們射殺了，有時甚至是整個隊伍的滿族人被槍殺。在其中一道門口，一個大約十至二十人的滿族羣組被冷血地殺害……至於被殺者的數字……根據在革命期間住在縣府的外國人的估

計，有不少於一萬，他們是被殺，或是爲免被殺而自殺的。」⁴¹

有一羣滿族基督徒，據推測可能是浸信會的教友，當時正在西安的東部郊區出席星期日的崇拜而未有留在滿族人居住的城市，因而逃過一劫。⁴²很明顯地，西安的滿族人是「過去十年宣揚革命思想的書所製造出來的激烈種族主義」的受害者⁴³，但在這事件中，出乎意料之外，有些外國傳教士亦受到攻擊。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下午夜時分，一羣「憤怒的羣眾」襲擊北美瑞挪會瑞典傳教士的住所。柏克曼太太（Ida Beckman, 1865-1911），她的女兒、五個瑞典學生和他們的教師瓦特臣（Wilhelm T. Vatne, 1889-1911）在事件中

⁴¹ Charles John Keyte, *The Passing of the Dragon: The Story of the Shensi Revolution and Relief Expedition*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13), pp. 44-45.

⁴² Borst-Smith, p. 21.

⁴³ Rhoads, p. 228.

⁴⁰ Ernest Frank Borst-Smith, *Caught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Record of Risks and Rescue*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12), p. 20.

被殺。事件非比尋常。在中國的其他地方，共和黨人和朝廷軍隊都小心保護傳教士的性命和財產，司慕德指出，這次傷害外國人的不是革命份子，而是「一羣懷怒與淫亂的暴徒」。⁴⁴生還者白錦策(1866-?)宣稱，西安的革命份子大部分是哥老會的成員。⁴⁵

在這些血腥鬥爭中，天主教傳教士最少一次促成漢族人與滿州人之間的和解。在湖北荊州，八旗軍經過漫長的圍困後，比利時方濟會士馬修德(Marcellus Sterkendries, 1865-1928)在和平談判擔當調停者，滿族人同意交出他們的武器，

包括二千枝步槍和十六枝大砲，保存在天主教堂內。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滿族將軍連魁前往方濟會傳教中心投降，革命黨人在唐犧支(1887-1924)的指揮下進駐荊州，沒有對滿族人進行報復，有些生還者因而皈依基督信仰。⁴⁶

事件的後果

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紀念臨近，無疑地，這週年紀念將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慶祝。儘管歷史書中對這場革命有標準的解釋，但它不可能是一次沒有流血的事件。傳教士的報告指出，在革命期

⁴⁴ Borst-Smith, p. 25.

⁴⁵ E. R. Beckman, *The Massacre at Sianfu and other Experienc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 of North America* (Chicago: [J.V. Martenson], 1913), p. 48, 91, 104. There was also an Italian Franciscan mission in Xi'an, but it has not been possible to obtain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experiences of the friars and their converts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upheavals in the Shaanxi capital.

⁴⁶ Rhoads, *Manchus and Han*, pp. 198-200; Carine Dujardin, *Missionering en moderniteit. De Belgische minderbroeders in China 1872-1940*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28-230, with a photo of Sterkendries and a group of Manchu converts on p. 200; Fidelis Vrijdaghs, *Een Belgische missionaris: P. Marcellus Sterkendries, minderbroeder redder der Tartaren* (Mechelen: S. Franciscus' drukkerij, 1925).

間被殺害的和受傷的人，絕大部分是滿族人。此外，在內地普遍的無政府狀態，一定對中國的平民百姓，包括皈依基督信仰的中國人，造成重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另一方面，除了在西安的外國社區之外，傳教士並未因軍事衝突而過度困擾，難怪許多基督教徒，特別是那些住在安全的大都會中的，都傾向於支持革命運動。在促進民主和共和的想法方面，美國人所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在一九一二年初，當政局尙未安定，一位基督教傳教士為基督教信仰作出了正面的預測。「當革命成功後，世界將發現中國人文明和美好的素質，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許多有關中國的謎團將會消失，而人將會看到事實本身。他確信教育、自由和宗教寬容會帶來正面的結果，「迫害的精神將在這次革命之火中永遠被消滅」。⁴⁷

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芳泰瑞(Courtenay Hughes Fenn, 1866-1953)認為，「大部分人都同意，在中國發生的革命是傳教工作的成果；過去和現在的傳教工作，是革命的其中一股主要的動力。」他總結說：

像現時在這個國家發生的革命，要求所有的傳教人員全力奮勉，把握一切新的特權和機會，改良我們的方法，為達致我們所希望的、那場更偉大的革命，即基督的王國得以在這新的共和國中建立起來。只有當這強大的管治力量滲透進內，才能為真正的共和國建立牢固的基礎，保障公民的自由，促進它的繁榮，使它為世界成為一個祝福，而不是危險。⁴⁸

⁴⁷ Editorial, *Chinese Recorder* 43.1 (January 1912), pp. 3-4.

⁴⁸ C. H. Fenn, "Mission after the Revolution", *Chinese Recorder* 43.11 (November 1912), p. 635.

正如以下基督教宣道會的評語中指出，美國福音派的傳教士對於基督教在中國的未來發展同樣樂觀。「中國經歷過一場偉大的政治革命，雖然為傳教士帶來一時的危險，以及暫停傳教工作的必要，但無容置疑，中國將對傳教事業更加開放，提供更多支援。」⁴⁹ 基督教宣道會傳教士希迺錫（Isaac L. Hess, 1856-1923）的夫人（Harriet Rutherford Hess, 1865-1967）從廣西梧州匯報：「我們有理由相信，革命所帶來的新局面，將會為天國的來臨造就更多美好的、前所未有的機會。我們在這裏已經感受到了。基督信仰本是受到藐視的，現在突然受到歡迎；外國人和本地的基督徒並非受到憎恨，而是尊重。」⁵⁰

來自歐洲的基督教傳教士，對改革運動和

革命的態度不一。同樣，天主教神父們在他們出版的記載中，沒有對「革命份子」作出明確的評論。所有傳教團體所關心的，是為實踐他們的使命所需要的宗教自由，以及安全穩定的環境。雖然宗教自由在共和黨憲法中受到高度重視，傳教士們仍然恐懼袁世凱總統在位期間的保守勢力，會竭力令儒家學說成為中國國教，從而破壞憲法所保證的宗教信仰自由。同時，剛誕生的共和國，幾乎從開始就被捲進一連串的軍事衝突和社會動盪，但正在這混亂的時代，傳教士有充裕的機會，擔當治療者、支援者、保護者和斡旋人。這說明外國傳教士適應了各地的情況，而他們的工作受到普遍的讚賞。到一九二零年代，在中國工作的傳教士將面臨真正的挑戰。

□

⁴⁹ *The Alliance Weekly* 37.17 (27 January 1912), p. 257.

⁵⁰ Mrs I. L. Hess, "Wuchow Items", *The Alliance Weekly* 38.8 (25 May 1912), p. 121.